



在现代文学史上,萧军是一个特殊的人物,他一生牵涉到许多重要的史实。鲁迅是他的恩师,毛泽东引他为知己。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东北作家群的领军人物,是撰写中国人民奋勇抗日小说的第一人。他一生遭际坎坷,这与20世纪中国大环境有关,20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是非常不平凡的。在这个世纪中国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这个壮举是千千万万的人百折不挠才成就的。萧军是其中之一。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离休干部鹿野在纪念萧军的文章中写道,“萧军曾多次对我说:‘半个多世纪以来,我的为人,为文的目的有四:就是求得祖国的独立;求得民族的解放;求得人民的翻身;求得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的实现。如今这四个目的基本都达到了,因此,我没有什么遗憾了’。”同时萧军个人的性格也是他坎坷遭遇的重要原因。他在与《萧军评传》的作者王科,徐塞谈话时多次戏称自己是碾盘沟里蹦出来的“石头疙瘩”。这样的自嘲是萧军的知己之论,是非常契合他的性格特征和人生遭际的。

### 碾盘沟“屁股温冰”的少年

“屁股温冰”是鲁迅对萧军小时候一种恶癖的叫法。萧军在《我的童年》里写道:“卧冰是我儿时一种要挟人的恶癖。当我四五岁时,还穿着活裆裤的年代,大人们如果惹了我或骂了我,冬天,院中有着结成冰的水堆,我会把裤子剥开……坐到冰堆上去。有时候可以使自己的体温把那冰化成两个小小的‘洞’。”萧军对自己的这一做法解释是“恃宠而骄”。这需要多么倔强多么壮盛的灵魂才能做到呀,是怎样的生活练成了萧军如此灵魂的?难怪萧红要说萧军是具有强盗灵魂的人。

1907年7月3日,萧军降生在辽西一个大约有着两三百户人家的下碾盘沟村。俗语云“凭父儿贵”,萧军的出生却没有带给他母亲任何一丝“贵”气。脾气暴躁的父亲对母亲的一顿残酷鞭打,使母亲失掉了对人世的留恋和生的希望。她一声不响地吞吃了大量鸦片,舍下才7个月大的孩子走了。嗷嗷待哺

1949年新的文学秩序建立以后,以萧军当时的处境和身份,他的作品原本是没有资格出版的。因历史问题或政治身份问题无法出版作品的例子很多。1953年开明书店与青年出版社合并后通知沈从文:解放前出版的“沈从文著作品集”中各书内容过时,凡已印、未印各书稿及纸型均全部代为焚毁。沈从文只在1957年文艺环境宽松时出过一本小说集。据鲍昌回忆,“我头上有顶右派的帽子,正在农村‘脱胎换骨’,那时的说法是,我这种人根本不配再出版作品,因而也就不敢对出版社有着望了”。(鲍昌:《待到百花成蜜后》,《我与百花》,百花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66页)王西彦的《在漫长的路上》被认为是“鼓吹‘反动’的‘中间人物论’的标本”,据王西彦回忆,一位百花出版社的编辑告诉他,“上海有关方面以组织名义通知出版社不能出版我的作品,已经出版的不再重印,正在发表的要停下来,更不必说接受新的稿子了”。(王西彦:《抹不去的记忆》,《我与百花》,百花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18页)从1948年到文革结束,萧军一直被打入另册,按照正常的情况,他的作品是没有出版资格的。哪些作家能出版作品,显然要看其政治态度和政治表现,左翼作家和具有进步倾向的作家的作品当然是首选,以此建立革命文学的正统性及其在新中国成立后文学中的示范作用。那些与革命关系疏远或有历史矛盾的作家则被排除在外。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受到大批判的萧军的状况当然不会更好。

1948年8月萧军个人主编的《文化报》与中共东北局宣传部领导的《生活报》之间为8月15日《文化报》一篇社论展开激烈论争,萧军的行为被视为与党对抗。1949年5月东北文艺协会作出《关于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结论》,接着中共中央东北局做出《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认为萧军“用言论诽谤人民政府,诬蔑土地改革,反对人民解放战争,挑拨中苏友谊”,“如果萧军坚持他的错误,那么他的荒谬言论,就将成为封建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在被中国人民推翻以后所必然找到的反革命政治工具”。萧军拒绝在结论上签字,并对刘芝明说:“你要能批得我少吃一碗饭,少睡一个钟头觉,我都佩服你!”“咱俩的账没完!不过今天不跟你算了。”20年后他俩再算。你的报纸白纸黑字,油墨印,擦不掉,抹不去,我的也一样。20年后再看!”萧军这样的态度,被划归“完全自绝于人民的文化行列”。(参见钱理群:《批判萧军》,《文艺争鸣》1997年第1期)

萧军“对抗党组织”的后果就是被排除出作家队伍,同时被中止了文学资源和文学利益的分配。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有着突出文学成就的萧军不是代表,因为萧军“到了延安,因为反党,受过批判,以后到东北,还是反党,又受批判,所以不让他参加全国文代会”。(葛献挺:《萧军的残

# 经典作家专刊

## 萧军的坎坷求知路

□南梔子

的萧军白天经常由家人抱着到每一家有乳儿的女人那里去“赶奶”,晚上就吃浆糊。最后好不容易寻到了一位乳母,这位乳母把萧军喂养到了5岁,后被辞退。乳母哭着不舍得离开,萧军哭着不让她离开。然而他们最终还是分开了。

萧军懵懵懂懂地知道了母亲的死与父亲相关时,他那童稚的心即刻被强烈的复仇的欲望所充满——长大了我要“给妈妈报仇啊”,他开始憎恶父亲——“我愿意见到任何人,却不愿意见到他,不管他对我是偶然的爱抚或亲近,我却永远恐惧和憎恶他。甚至我一听到他的声音,就像由春天一下子跌进秋天,我要逃跑啊!我不愿见到他!永远也不愿见到他啊!”

父亲常年为作坊忙着,还野心勃勃地经营了一家商号。“一些镇上警兵们,经常挂着枪到父亲的商号和工场里来行走了。……一到夜间,祖父和父亲总是检查着账目;或者是无言相对地垂下自己的头。……有时候虽然已近夜深,祖父也还是骑了那匹大黑驴,悄悄地走了,直到第二天才能回来——他是去筹钱。”这诸多的工作和诸多的不顺,父亲哪有闲暇哪有心情对萧军有好声气呢!“父亲从来对我是没有怜惜的,我在外面和孩子们打架无论吃了怎样的亏,他总是责骂或者殴打我;如果我打了人,他要责骂我不该欺负人;我被人打了,他又责骂我无能,不是他的种子,没有出息,是‘胚包货’!”

祖母和姑姑是爱他的。祖母和姑姑的爱却是不完全的。姑姑出嫁了生育了,萧军感到姑姑更爱自己的孩子了。意识到这一点,他觉得自己的心里钻进了一块冰。他的世界一片寒凉啊!

萧军的童年岁月是民不聊生的乱世。日俄战争后日本和俄国瓜分了东北,清王朝灭亡后东北人民又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双重统治之下。在这严苛冷酷的乱世中经常有被生活抛出正常轨道的人们。这些生活无着的人有一条出路就是上山当“胡匪”,萧军的二叔也上山了。全家人因此凄凄惶惶地过日子,家里的氛围总是有点诡异,“家中没有一个人告诉我关于二叔的任何消息,他们全鬼鬼祟祟嘁嘁喳喳地谈话”。有一次二叔和官兵打仗受了伤,他偷偷地来到村子最东端僻静的四姑家,想养几天并弄点药。祖父和祖母知道后默默地赶去见他。萧军偷偷地跟在后面赶到四姑家,贴着窗台,尖起耳朵想听到屋内的动静。祖父的咳嗽声、祖父和祖母的争吵声、四姑的责备声……当二叔的声音传进他的耳朵时,萧军不顾一切地推门而进。屋内人全都吓着了,发现是萧军时,“也没有见过你们这孩子,胆大包天……”四姑责备萧军道。

听到四姑这句话,萧军先则不满,继而愤怒,终而伤心。“因为她竟把我叫做‘你们这孩子’”,而这是明显地把我和‘她的’孩子分隔开了!……她竟这样一条鱼儿似的把我抛出她那母亲之爱的河水之外。”姑姑不是妈吗!

五姑生第一个孩子,萧军与四姑一起去看望她。五姑可能担心萧军打架有失娘家和自己的体面,她告诫萧军:“我们村里可不许骂人,打架……人家要笑话。这里的人不会骂人……听见吗?”萧军“觉得五姑不再是我原来的五姑了,自从她出嫁以后,似乎不再关心到我。虽然我是那般认真地想着她,关心她……但她却忽视了我的心!这使我感到一种悲哀和寒凉。”姑姑的村不是萧军的,姑姑的生活里萧军占的分量不大。

## 萧军小说的出版(1949—1966)

□王秀涛

写作过程中,对于这类新的题材、新的斗争……一种试练,缺点应在意料之中。有机会我还希望自己能写出一些较像样的东西来,以报读者”。但《过去的年代》却是萧军历时20年创作的精神之作,严家炎认为,“萧军的成就最高、最出色的作品应该是长达80万字的《过去的年代》”(一名《第三代》)。如果要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排出十几部的话,那么,《过去的年代》完全可以当之无愧地列进去的”。(严家炎:《三点感悟——在萧军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的发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6期)《五月的矿山》在1954年1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只给印了两万两千册,“比起其他的作家的作品一印几十万册就太微不足道了”。30年后,萧军说,“这本书那时虽然经过党中央主席批准,勉强得以在1954年出版,而最终还是被出版界的官僚主义者们扼杀——决不再版了。”(《萧军全集》第12卷,第587页)《过去的年代》虽然也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但“人民文学出版社也不履行合同,借口纸张困难延不出版”,出版社要求萧军将85万字压缩到20万字,萧军不同意,说,“你们有本事就由你们改写压缩吧!我没法改”,因此这部小说直到1957年才得以出版。(王德芬:《安息吧,萧军老伴!》,《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2期)当然《过去的年代》出版的推迟,还与编辑的更换有关,据牛汉回忆,“我被捕前,1954年他有一个长篇,交给我当责编,我曾经去找他,请他写一本跟个人经历有关的书。1955年,《过去的年代》还没有成书,我就被捕了。我们社的龙世辉帮我看的校样”。(牛汉:《文坛师友录》《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4期)

《五月的矿山》出版后,萧军给胡风送去新书,“喜悦心情不亚于当年《八月的乡村》出版时”,“歌颂工人阶级的《五月的矿山》,是应该受到欢迎的。我们衷心地祝贺他,他却不胜感慨地说,‘真不容易啊,冯雪峰不肯出我的书,还是我去信给毛主席,他直接批示下来,他们才答应’的。并且,以后再有书也可以出了。’言下有点舒了一口气的自得之意”。但不久,1955年第24期《文艺报》就发表了《萧军的〈五月的矿山〉为什么是有毒的》的文章,批判《五月的矿山》,“这不是是萧军反动思想的再版,是对于现实生活彻头彻尾的歪曲,是对党和人民彻头彻尾的诬蔑。我们感到愤怒,当全国人民满怀信心向社会主义进军的

一种空漠漠的哀愁笼罩着萧军,这人间是如此空旷而孤独呀,自己和谁也没有关联。于是桀骜不驯的萧军不管不顾地打架、逃学。强梁的坚硬的个性在没有母爱的润泽下逐渐形成了。

### “成葫芦”是这样炼成的

“成葫芦”与“瘪葫芦”是一对反义词,我理解为有出息的孩子即是成葫芦,反之就是瘪葫芦。萧军6岁进族人设立的私塾馆,半年后转入沈家台镇的洋学堂。一个从小没有了娘的孩子,成天要学“人、手、足、刀”什么的,多无聊呀!萧军想念家乡的山,想念一同放牛羊、放猪、打柴的小伙伴。他没法忍受学堂生活,他开始逃学了。父亲拿萧军没办法,痛打了他一顿后,只好放他回碾盘沟村了。

世事如此难料,8岁那年父亲因商号发行的债券无法兑现,破产了。萧军跟着祖父和父亲过了一段流亡生活。回来后,萧军或上山砍柴或下田锄草。看着那些读书的孩子,心里非常嫉妒和痛苦。他想读书,为了听清楚房里的读书声,他爬上平顶小房,蹲在房顶上。有一次被先生发现了,先生了解情况后,愿意免费教他。“在这次读书中,我却一次也没逃过学,而且成了一个好学生。”即便如此,萧军还是没能读下去,他必须去打柴,否则生活就无法维持下去了。

破产了的父亲在长春开了家“隆记玻璃庄”,稍有了点积蓄就托人把萧军带到他的身边来。1917年冬萧军被村人带到长春。不久,父亲又送萧军上了吉长道立商埠国民高等小学。重新获得学习的机会,萧军非常珍惜。这是长春一所颇有名气的学校。萧军开始在小学二年级插班,很快就转入了三年级。在这所学校,萧军的文才得到了崔树屏、李景唐两位老师的赏识。崔老师对萧军四年级毕业作文评价尤高,他这样激励萧军“鹏程万里,未可限量,孔子曰,后生可畏,好自为之”。主持“军国民教育”的王老师还指派他为军歌领唱。老师的肯定对学生有着不同一般的魔力。或许曾经的失学经历也激发了萧军的求知欲,他像一条饥肠辘辘的蚕不停地啃食桑叶那样,拼命地读书。他喜好楚辞,爱读小说,历史、武侠、志怪、公案、言情一个也不放过。碾盘沟村的石头疙瘩竟是一块可雕琢的宝石。

人生总有许多不能预料的事。当萧军在商埠小学进到高等三年级时,崔李两位老师双双离开了。这对萧军是一个打击。“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犹如一个人进入了一座空荡荡的没有人烟的古城堡一般。”这时“屁股温冰”的一根筋的固执劲又出来了,萧军没能很好地调适自己,任由情感狂潮淹没自己,看哪个老师都不顺眼,没有人能填补崔李两位老师在萧军心中的空缺。相反级任巴老师还经常苦告萧军,“你们的崔老师总是到处夸奖你的作文如何如何好,就是这么两下子呀!”或许是萧军无意的“目中无人”刺激了级任老师。体育教员叶老师也看不惯萧军,在出“球杆”操时,萧军做错了个动作,叶老师批评他,并要求他出列。萧军把球杆摔在地上说:“出来就出来!我就不上你这门团体操!你个‘夜猫子’!”这下石头疙瘩萧军遇上了愣头青。叶老师把情况报告给校长,并提出辞职。不如此,就得开除萧军。校长要求萧军向叶老师赔个礼,萧军拒绝赔礼,接受了开除。

由于学校对萧军的处罚与他的过错太不相当,有几位同学为了表示抗议愤而退学了。这几位同学主张萧军先不要告诉父亲,每天都假装上学。其中一位叫王世忱的同学不但为他联系了一个处所“山东会馆”——一个空置的二层小楼,还每

时候,萧军不仅没有认真、彻底肃清自己的反动思想,反而继续抱着他那一套丑恶的“哲学”,继续散发着毒害人们灵魂的病菌,这是不能令人容忍的。”但萧军仍然没有按批判的调子写文章检讨,一律不予理睬,“大不了不让发表我的作品不让你出书!我照样写我的。”(梅志:《友谊长存》,《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2期)

此外,萧军的作品都是经过修改后才得以出版的。龙世辉曾回忆了当时要求萧军修改作品的情况。《过去的年代》“30年代曾以《第三代》为题发表过几篇文章。鲁迅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及。该书后面绝大部分篇幅是作者陆续写成的,并未发表,存在着不少问题,鲁迅先生自然也没有看到。可是作者以鲁迅肯定肯定为理由(其实仅提及),拒绝做任何修改,和编辑都打笔仗,原责任编辑牛汉同志因胡风问题受审查,我接替他工作,和作者继续没完没了的笔仗,书信往来频繁。当时,我怕作者知道我是一个刚出校门不久的年轻编辑,书信故意毛笔直行书写,用半文言文体,一律繁体字,由于坚持原则据理力争,反复论战,后作者终于修改得使我们比较满意。”(李颀:《龙世辉的编辑生涯》,河南大学1992年版,第27页)

《过去的年代》虽然经过了修改,但修改的内容龙世辉并没介绍。《八月的乡村》是重版,修改的内容就很明了。萧军在后记中说,“这小说此次被决定重排之前,我又从把头把它校改一遍。在校对过程中,除开依照人民文学出版社方面提出的一些意见,作了适当的修改而外,自己发觉有不适当或文字错讹的地方,也做了必要的删、添或改写”。有学者查对此书之前的版本,发现1954年的重排本有多达600处的修改,“最引人注目的修改,就是对新的国家意识形态或主流话语的迎合”,譬如改动了有损正面人物的词语,作者还对当时各种批判所做出的直接回应,如针对“挑拨中苏关系”及“各色帝国主义理论”的批判,作者将“俄国人”改为“过去的俄国人”,将“帝国主

天为他提供午餐,“一大卷裹着油条的热热的煎饼和一壶开水”,萧军天天到山东会馆去“上学”。这样的日子维持了半年。这半年萧军读了不少书,其中就有《聊斋志异》《西游记》《济公传》《七侠五义》。

被开除的消息最终还是被父亲知道了,“你也不用隐瞒我了,你早就被学校开除了,我早看透了,你也不是那份有出息的读书胚子……你乐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自谋生路去吧!”父亲对萧军的判断是不对的。他的儿子此时虽说不上满腹经纶,但胸中也是装了不少笔墨的。家道的衰落和求学的坎坷成就了萧军,他不是一个瘪葫芦,而是一个成葫芦。

### 军营中的“字儿兵”

“字儿兵”是专门负责抄写文书的“见习上士”。我这里拿来借指爱读书的士兵。父亲不肯继续供萧军上学,也不愿意他跟着自己爬楼上房装嵌玻璃,萧军干什么去呢?这时东北处于大小军阀的统治下,人们把当兵看做一条出路,当成一份近乎光荣的职业。在这大时代风气的影响下,1925年春,萧军经同乡介绍到吉林巴尔虎军营当了一名骑兵,领到一份饷钱,算是能自己养活自己了。巴尔虎骑兵营有四个连,“其中只有一个连的马是官家的,称为‘官马队’;其余三个连称为‘私马队’,就是说这马是当兵的人自有的”。萧军没有马,人又有点文化,小楷也写得不错,被选为“字儿兵”。字儿兵的工作就是军营里抄写文书的,可以穿便装,随便出入营门。抄写的活儿并不多,萧军有大量的可支配时间。这军营中的生活对萧军来说其实是学生生活的延续,或者说是拿薪水的学生生活。

在巴尔虎骑兵营,萧军认识了罗炳然、偶遇徐玉诺、结识了方未艾。

精通四书五经诗词曲赋的罗炳然,把怎样做古诗体的看家功夫,全都教给了萧军。本来就喜欢楚辞的萧军学做古诗体热情非常高,他整天抱着《诗韵合璧》等工具书,仔细揣摩诗歌的韵律,认真熟读名家诗词。萧军的古诗体功底就是这时打下的。严家炎在萧军诞辰百年纪念会上的发言中如是说:“五四文学革命提倡新文学以后,写旧体诗的人不多了,老一代中只有鲁迅、郁达夫、郭沫若等写得好,稍后的就只有聂绀弩、萧军等在写而且写得比较出色。”萧军与徐玉诺的相遇是非常偶然的,前面说到字儿兵的活儿不多,抄完完文书以后,萧军习惯到附近的公园看书。有一天,他带着于廛虞的《晨曦之前》和鲁迅的《野草》去到公园,看了一会书,感到有点乏,竟躺在一张石桌旁的躺椅上睡着了。醒来发现一个人伏在桌上写东西。这人就是徐玉诺。看到萧军多带的两本书,徐玉诺把萧军视为同类,侃侃而谈地给萧军讲了一通诗的理论 and 鲁迅的散文诗。萧军对鲁迅的喜爱或许是徐玉诺种下的种子。方未艾对萧军的影响主要在散文方面,在与他的交往中,萧军开始接触到新文学和外国文学,他阅读内地出版的新刊物,如《小说月报》《语丝》等,阅读《苦闷的象征》《战争与和平》《少年维特之烦恼》以及拜伦和雪莱的诗歌。萧军以后弃武从文的道路选择,在这里埋下了根由。

1928年冬天,萧军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第9期炮兵科。“那时的军校,除开军事教程及参考书以外,任何杂书都不许涉猎,特别是进步文学作品。”一次平射炮演习,萧军作为预备炮手,他利用空闲时间拿出《石达开诗抄》来读,没成想一下子读进去了。当有人提醒他时,炮已经在半里地之外了。这天夜间,萧军为此遭到了一顿毒打。如此迷恋书,如此不务正业,好像不太适合在军营待下去了。

1930年夏,在讲武堂就要举行毕业典礼前夕,“石头疙瘩”萧军又一次被开除了。这次被开除的表层原因和上次一样,也是“冒犯尊长”。深层原因是“石头疙瘩”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气。一天,炮兵队挖掘掩体回来,经过步兵队战壕作业区。由于误会,两队发生了口角。这时步兵队队长殴打了萧军的同学,萧军上前制止,这位队长就作势殴打萧军。萧军顺手抄起一把铁锹朝他的头顶劈下去。要不是有人抱住了他,非出人命不可。

萧军离开了讲武堂,基本上结束了学生生涯。

义”改为“日本帝国主义”。还针对“很主张色情的狂热”的批判,对内容进行删改。(金玄宇、彭树涛:《〈八月的乡村〉:版本与修改》,《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12期)这种修改在1949年以后的文学出版领域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八月的乡村》最有意味的修改体现在“体例”上。1978年萧军在此书的《重版前记》里重新提到1954年出版情况时不无不满和质疑:“1954年这小说要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以前,该社负责人之一曾向我提出,由于该社所规定的‘体例’关系,凡这小说原来所属有的《序言》《前记》《后记》……之类,一律不能附载,否则碍难出版云云,该社既然有如此规定,本人也不能有所例外,只好遵从该社的‘体例’规定,同意把鲁迅先生的《序言》取消了,本书出版由作者所写的《书后》取消了;再版的《再版感言》取消了;《奴隶之爱》曲与词也取消了……”萧军认为这是针对他的个别行为,“由于最近看到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出版的《萧红全集》,其中《生死场》和《呼兰河传》由鲁迅先生和茅盾先生给予该书所作的《序言》全是存在的,这可能是出版社方面来所规定的‘体例’有所改变了?或者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是对于《八月的乡村》作者本人的作品特别有此‘体例’规定”。

删除鲁迅的序言并不难理解,“反党”的萧军和政治地位极高的鲁迅是不匹配的,因此鲁迅对萧军作品的赞美就显得不合时宜。鲁迅曾给《八月的乡村》以极高的评价,“不知道是人民进步了,还是时代太近,还未淹没的缘故,我却见过几种说述关于东北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毁灭》,然而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灾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蝴蝶,蚊子,搅成一团,鲜红在的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八月的乡村》能够再版已属格外开恩,再用这样的序言提高萧军作品的地位显然是一种奢望。更重要的是,萧军是鲁迅的学生,但“反动”的萧军已无资格保持与鲁迅的这种亲密关系,这种关系只能让鲁迅的现象变得暗淡。因此萧军对鲁迅思想的理解和继承只能被认为是一种“误解”和“滥用”。去掉鲁迅的序言,既是对萧军作品的低调处理,也是淡化萧军与鲁迅的关系。

本专刊由中国现代文学馆协办